

《湘军志》的史学成就

胡苏珍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 王闳运的《湘军志》自问世以来, 便争议不断, 遭到了以曾国荃、郭嵩焘为代表的一批湘军将帅的强烈抨击, 后世学者对他的评价也是仁智互见, 推为良史者有之, 污其为谤史者也有之。本文通过对王闳运的治史态度、取材思路、历史认识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以求能客观、公正地揭示《湘军志》的史学成就。

关键词: 王闳运 湘军 湘军志

中图分类号: K061

文献标识码: A

一、不以歌功颂德为目的的治史态度

湘军由曾国藩在咸丰二年创建, 其部将以湘乡诸生罗泽南、王鑫等人为主, 其练军方法仿照了明朝戚继光的成法。由咸丰三年开始出战, 从湖南出发东征, 转战于长江流域, 南至闽、广、滇、黔, 北至两淮, 西至川陕, 东至于海。先后平定了太平天国、捻军等反清力量, 直接挽救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统治, 开创了所谓的统治中兴。战后, 清朝从朝廷到地方均对湘军这段历史有所叙述, 如清廷相继组织编撰了《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平定粤寇纪略》、《平定发捻方略》等, 各省则出现了奏稿、志书等颇多记述湘军史事的书籍等公私著述, 但这些《方略》和公私著述, 主要是从歌功颂德的角度进行论述的。

其实湘军的崛起及其“平乱”的过程不止只有功、有德, 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与功和德不相称的一些缺陷和阴暗面, 湘军的统帅们也不止只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一面, 同时也存在着决策失误、争权夺利的一面。对后一方面的内容, 当时的公私著述都本着“为尊者讳, 为亲者讳”的态度, 对此讳莫如深。但王闳运在编撰湘军史书《湘军志》时却不是这样认为的, 他提出志书的撰写应当针砭得失, 而不是只歌颂, 尤其不应只是歌颂曾国藩等湘军将领的战功, 正如其在《湘绮楼日记》中所写。

“光绪四年四月十四日, ‘作《军志》, 叙多功于曾军, 使稍生色, 亦以对砭其失。军不可惧, 孔子以惧教子路, 言其轻死耳, 非谓行三军当惧也。’ ”^①

正是基于对官方文书不完全相信的态度, 所以他在书写湘军历史时, 不仅着墨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的战功, 而且对清朝的腐败、湘军在“平乱”过程中的艰难、挫败及战略、战术上的失误都有客观的描述, 特别对湘军将帅的内部矛盾、部分湘军将领的残暴、贪婪以及部分湘军营伍的军纪败坏等情况都如实地予以了记录。

关于清军的军纪败坏的记述, 《湘军志》中有这样的记述: “咸丰二年冬, 湖北大营患

^① (清)王闳运著, 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 岳麓书社, 1997, 653.

潮勇横恣，罢遣之归，乃益道掠，公奸良民妇衢市，所至焚杀。愚民以为官兵不如寇，则奸人倡为议，谋通贼，及结盟拜会相挺起矣。”^①王闳运认为正是由于当时清军湖北大营的兵勇横恣，兵到之处，四处抢掠，给百姓留下“官兵不如寇”^②的印象，造成各地百姓“结盟拜会相挺起”^③的结果。志书中几乎直接点出了官逼民反这一事实，认为各地烽烟四起，与清军的骚扰、军纪败坏、烧杀掳掠，以致失去民心有密切关系。这样的记述，在当时，一般著者是断不敢予以记录的，王定安在《湘军记》中也没有类似这样的记述。

关于湘军战败的情形的论述。主要记叙了咸丰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领水师战败于靖港之事。在《湘军志》中，靖港之战原先议定的计划是进攻湘潭，但在进攻湘潭之前，曾国藩接到线报称靖港的太平军守军只有区区数百人。于是，又改变计划，于四月二十八日亲率水师战船四十艘并陆营八百余人，扑向靖港。^④结果，“寇出，团丁遽反奔，官军亦退，争浮桥，桥以门扉、床板，有多桥坏，死者百余人。”^⑤由于水师的溃败，陆军也纷纷溃逃，为了争夺逃路，湘军将士彼此自相践踏，众多将士落入水中，曾国藩没能料到局势溃败得如此之快。看着匆忙逃命的湘军将士，曾国藩气急败坏，于是“亲仗剑督退者”^⑥，并“立令旗岸上曰：‘过旗者斩’。士皆绕从旗旁过，遂大奔。国藩愤，自投水中，章寿麟负之还船”^⑦。王闳运在《湘军志》中叙述靖港战役失败的原因时，认为是由于曾国藩的错误决定所造成的，并且还细致生动地记载了湘军失败的经过以及曾国藩投水的情状。作为同样是记载湘军历史的《湘军记》，王定安对靖港之战只是简单地写道：“战不利，水师骤返，为贼乘。陆军与团丁亦溃，夺浮桥走。国藩不能止，发愤投水，左右夫之出。”^⑧

王闳运《湘军志》对于湘军与地方军、湘军将领之间的矛盾也均加以记叙，这在《湘军记》里也是少有记述的。如：在《筹饷篇》中记载了曾国藩与江西巡抚因为饷款的矛盾。“同治二年，国藩征饷江西九江关道，蔡锦青分税课以应”^⑨。当上报给巡抚时，沈葆楨大发脾气，“谩词诋锦青”^⑩。曾国藩听闻后，不能忍受，于是和沈葆楨上奏争辩，并且还自行求劾罢官。最后，以朝廷发放上海税银三十万给曾军，这件事才得以和解。这一事件在《湘军记·援守江西下篇》中并不是这样记载的，当写到沈葆楨对于蔡锦青将江西九江的养税分给曾军而大发脾气时是这样写的，“移文诘问国藩，国藩逊词谢之”^⑪，并不是像《湘军志》

^① (清)王闳运. 湘军志. 湘军史料四种. 长沙:岳麓书社, 2008, 19.

^② (清)王闳运. 湘军志. 湘军史料四种. 长沙:岳麓书社, 2008, 19.

^③ (清)王闳运. 湘军志. 湘军史料四种. 长沙:岳麓书社, 2008, 19.

^④ 王继平. 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287.

^⑤ (清)王闳运. 湘军志. 湘军史料四种. 长沙:岳麓书社, 2008, 19.

^⑥ (清)王闳运. 湘军志. 湘军史料四种. 长沙:岳麓书社, 2008, 19.

^⑦ (清)王闳运. 湘军志. 湘军史料四种. 长沙:岳麓书社, 2008, 19.

^⑧ (清)王定安. 湘军记. 湘军史料四种. 长沙:岳麓书社, 2008, 350.

^⑨ (清)王闳运. 湘军志. 湘军史料四种. 长沙:岳麓书社, 2008, 171.

^⑩ (清)王闳运. 湘军志. 湘军史料四种. 长沙:岳麓书社, 2008, 171.

^⑪ (清)王定安. 湘军记. 湘军史料四种. 长沙:岳麓书社, 2008, 399.

中所写的那样。在王定安的笔下,表现了曾国藩谦逊的性格,而突出了沈葆楨不顾大局,只顾自身的自私自利的形象。

另外,关于部分湘军将帅残暴、贪欲的叙述,在《湘军志》中王闳运对天京陷落时曾国荃纵兵劫掠,大量财宝搜括囊中的行为进行了披露性记载。天京城破,曾国荃把“江宁鎔货尽入军中”^①,造成“群言益讙,争指目曾国荃”^②甚至“诸宿将如多隆阿、杨岳斌、彭玉麟、鲍超等欲告去”^③,连“左宗棠、沈葆楨每上奏,多携讥江南军”^④,在众怒逼迫下,曾国荃“请病归乡里,散遣所部军二万五千人”^⑤,造成“大功虽成,然军气愤郁惨沮矣”^⑥的结果。王闳运这样记述是有历史根据的,据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所载,湘军攻入天京后就开始疯狂的烧抢活动,“烟起数十道,屯结空中不散,如大山,绛紫色”^⑦。并且开始了残忍的大屠杀,赵烈文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计破城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城上四面缒下老广贼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情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⑧另外,对于湘军垂涎已久的天京财物,他们先抢王府,再挖地窖,接着就逐户搜抢居民财物,掘坟盗墓,洗劫一空。“城内各军尚纷乱不止,兵勇互相掠夺,时有杀伤”^⑨;“取出金银不訾,即纵火烧屋以灭迹”^⑩;“淫掠之惨,俱载各书,湘军满载金银子女,联樯而上,万目共见”^⑪。对于这一史实,王定安在《湘军记》里只含混其词地说:“秀成既诛,谤者颇以未献俘为疑。”^⑫十余字便掩盖曾国荃劫掠天京的罪恶,并且把对曾氏不平者说成“谤者”^⑬。

最后,王闳运在志书中还论述了部分湘军士卒肆意妄为的情状,如在《湖南防守篇》中,王闳运这样写道,“饷不时发,又不令其军至省城,久屯金口,军士怨望,冯标等短于抚驭。超军号‘霆营’多收降寇,不乐西征,乃噪而叛,直掠而南,欲合福建寇”^⑭。这里,王闳

^① (清)王闳运.湘军志.湘军史料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8,72.

^② (清)王闳运.湘军志.湘军史料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8,72.

^③ (清)王闳运.湘军志.湘军史料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8,72.

^④ (清)王闳运.湘军志.湘军史料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8,72.

^⑤ (清)王闳运.湘军志.湘军史料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8,72.

^⑥ (清)王闳运.湘军志.湘军史料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8,72.

^⑦ 转引自朱东安.曾国藩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04.

^⑧ 转引自朱东安.曾国藩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05-206.

^⑨ 转引自朱东安.曾国藩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08.

^⑩ 转引自朱东安.曾国藩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09.

^⑪ 转引自朱东安.曾国藩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11-212.

^⑫ (清)王定安.湘军记.湘军史料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8,472.

^⑬ (清)王定安.湘军记.湘军史料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8,472.

^⑭ (清)王闳运.湘军志.湘军史料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8,19.

运写道由于军饷不能及时发放，以至于“霆营”^①叛变，加入福建太平军的情况。这一段在王定安的《湘军记》里未找到有所记载的。

正是由于他这种不以歌功颂德为目的的出发点，因而对湘军的记述在客观、公正方面要高于其他有关著述，成就了一部较客观的湘军史志。

二、博取精鉴的取材思路

湘军从曾国藩依据江忠源组织的“楚勇”办理团练时开始，一直到左宗棠用老湘营平定新疆。其活动范围广阔，遍及大江南北，中间由于战事而变化无常，或胜或败，或增或裁，千头万绪，种种不一。编写《湘军志》，史料的搜集和取材可谓是第一要务。对此，王闳运不仅广采官、私文书和著述，并对有关史料进行严格的把关和鉴别，充分体现了其博取精鉴的取材思路。

1、对官方史书兼信兼疑

在搜集史料时，对于当时主要用于炫耀文字武功、宣扬“平叛”功绩的官方文书《方略》，王闳运是花了极大精力进行了检视，以备参考。翻阅王闳运的《湘绮楼日记》，可以发现在撰写军志过程中，王闳运参阅了《方略》中的有关内容。光绪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作《军志》，阅《方略》二十本，检江西军事”^②；六月八日，“看《方略》，欲作《江西后篇》，翻四十本止”^③；光绪三年十月十七日，“夜翻《方略》，作《平捻篇》，阅三函，已四检矣”^④；十月二十七日，“重阅川陕事，翻《方略》八函”^⑤。

虽然编撰湘军史事时，对官方所修《方略》有所参阅，但王闳运始终保持着存疑的态度。如在《致徐伯澄》中，王闳运托其代办《方略》时谈到官修《平定发捻方略》，认为如果此书可以购买的话，那是可以买一本的。但是如果没买，要去抄写的话，就没有必要了。

“闳运今岁以湘中将撰军志，携妾入城，寓居凤凰台，饶秀野之趣。惟此书端绪颐乱，传述异同。私论官书，均当兼采。闻《发捻方略》八百卷，已用洋人活版印行，未知曾刷几部？可购致否？或须求借方得；顷书询叔鸿弟，乞其代办。倘须大力者，方可问津，则求我公为觅全部，以资考证。若必须借钞、旷日殚功，以求簿录，即亦不必劳费。以官书本不尽精详，且此志又不资公家言也。如有买则不妨多价亦办，是未宜惜钱。此亦（原文）庄生所谓两行者耳。”^⑥

对各省所存的相关案卷，他也持同样的态度，对案卷中的官方史料予以参阅，但对史事的真实性持谨慎的态度，并且认为各省所存的案卷过于繁琐，难以遍考。于是，退而查阅易于稽考的《清末各地筹防驻军报销清册》。但是对于《报销清册》，王闳运也不是全盘接收

^① (清)王闳运. 湘军志. 湘军史料四种. 长沙:岳麓书社, 2008, 19.

^② (清)王闳运著, 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 1997, 656.

^③ (清)王闳运著, 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 1997, 666.

^④ (清)王闳运著, 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 1997, 697.

^⑤ (清)王闳运著, 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 1997, 699.

^⑥ (清)王闳运著, 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诗文集. 长沙:岳麓书社, 1996, 804.

的，而只抄写有关于湘军营制的史料，以作参考，认为核实军兴以来湘军各营数量，如果完全依靠官府所编《报销清册》之类，是不可靠的。具体情况，可详见在王闿运在《致徐章京》的信中所云：

“闿运去年复有会试之意，行至长沙，为省人所留。今携妾暂居龙泉精舍，方议排比历年军事以述实迹。其中最难考者，各小营起撤日月，如募勇五百或三百，即有营官，有饷项，随生随灭。人视之无关轻重，而当时具有经画，最足以考证节镇之材否。而三江、两湖、闽、浙、齐、豫、川、广、云、贵、山西、直隶，俱有湘人为将者。或他人为将，而湘人为勇。此十六省案卷，岂能遍查；惟报销清册，易于稽核。同治三年，虽奉旨免报，其细册仍送贵部备查。镜初言：军机处方略馆能手一二人，均吾与弟相知好故，去冬谨托，并望同示，以便寄上使费及笔札之资。恐须吾弟面托前途，但抄湘营开立及遣散日月、人数、将弁籍贯，余皆不用。若册内并无兵勇籍贯及兵勇细数，则并不用抄（原作钦）彼虚假账目，以省劳神。此闿运等再四筹度，选贤而公举。吾弟之意，亦非以京官清苦，以此调剂之法也。”^①

对于相关奏稿，王闿运在参阅的同时，对史料的真实性同样进行了鉴别，主要参阅的奏稿有骆秉章的《湖南奏稿》、刘岳昭的《援黔奏稿》等。在编撰、取材过程中，王闿运下了很大的功夫进行了梳理。如王闿运在参阅骆秉章奏稿资料的同时，还发现了其中的误编之处，如《湘绮楼日记》所载：光绪七年闰七月四日，“和合送《骆文忠奏稿》一部，内有误编者，盖其家唯案时月，不看年分之故。苏庚堂据以作碑，然则谓碑志可补史，其说殊谬”^②。

湘军转战于湖南、广西、江西、湖北、安徽等各地，加之当时各地修地方志的风气盛行，参阅当地志书也成为了解湘军史事的一个重要渠道。从日记中，可以发现王闿运对相关各省的志书均予以参阅，并对其进行鉴别，甚至对有些志书的体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光绪三年四月四日，“从海虞借《浏阳志》阅一过。志书甚有条理，云陶翊云、涂优贡所辑，中叙兵事尤善，可备考证”^③。光绪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今日《蜀志》看毕，内无事纪一门，盖纯用地志之体，不及政事，而首载宸章，殊为谬矣。铁江甚诋之，余则惮其浩博，不敢妄议，以省志万无条理，无所谓佳劣”^④。

王闿运虽然对于立意于宣扬战功的官方文书并不认同，但在搜集史料时并未一意否认，而是尽可能地检索出可靠信息，以收集到足够充足的湘军史料。

2、对私人著述兼采兼评

战争结束之后，出现了大量的记载湘军历史的私人著述对湘军历史进行记载，主要有郭嵩焘、罗汝怀等人主编的《湖南褒忠录》、秦湘业、陈钟英主编的《平浙纪略》、赵烈文的《平捻记》。另外，湘军将帅曾国藩、胡林翼的相关文集也相继出版。王闿运在编撰《湘军

^① (清)王闿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诗文集. 长沙：岳麓书社，1996，807-808.

^② (清)王闿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670.

^③ (清)王闿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563.

^④ (清)王闿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736.

志》时，均对这些史料予以取舍和评判。

为了追踪湘军将士的下落，他参阅了《湖南褒忠录》。这本书是由郭嵩焘主事，罗汝怀完成的。同治元年，郭嵩焘与刘蓉书：“《忠义录》（即《褒忠录》）一书，不难于编纂，而难于采访，在局数月，规模略定，而颇苦于采访之难其人，顷已属之罗研生”。^①这是编辑湘军史的重要史料。王闿运虽然对该书评价不高，但在撰述《湘军志》的过程中，还是从中取材不少。正如《湘绮楼日记》所载：光绪四年二月十日，“次咸丰五年军事，殊不明晰，因念《褒忠录》虽断烂，既有成书，不可不详观。因为钞撰营官之可考者”^②；二月十二日，“检《忠录》二本，颇不若昨日之条晰，知其无益而不可不为者，此是也。为之则当有文理，今日殊草草，明当改之”^③；二月十三日，“阅《忠录》一本，又翻《名册》五本，熟思《军志篇》之局法，颇难见长，反不若史传地志之有纲领，亦甚闷闷”^④；二月十四日，“阅《忠录》，未摘录”^⑤；二月十五日，“阅《忠录》二本，未钞”^⑥。

为了记述左宗棠在浙江的战事，王闿运参阅了《平浙纪略》。该书是由秦湘业和陈钟英所编撰的，陈钟英，字怀庭，衡山人。据《湘绮楼日记》所载：光绪三年三月十一日，“怀庭寄《宋史》至，并《浙略》一部，多谀颂左公之词，其序他事，则颇有关系”^⑦；光绪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浙江篇》草成，中多未核，依怀庭书，略去其铺张者而已”^⑧。对于此书，王闿运认为叙事较为详细。但是，文中有关论述过于铺陈，对于左宗棠有过誉之词。因而，在撰写《湘军志》时对于其中的材料多有删减。

在编撰《平捻篇》的时候，王闿运参考过赵烈文的《平捻记》。赵烈文，字惠甫，江苏阳湖（常州）人。王闿运对于《平捻记》的态度，可以从王闿运《湘绮楼日记》中探得一些端倪。如：光绪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得怀庭书，送赵惠甫《平捻记》，阅竟乃过松宅”^⑨；光绪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作《平捻篇》，看赵惠甫《平捻记》，自胜王定安”^⑩。由以上记述可以看出，王闿运对于《平捻记》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对于湘军创始人曾国藩的著作，王闿运更是尽力收集，参阅了曾国藩的相关著作，如曾国藩的日记、文集、书疏以及年谱等。但他颇为自负，以致对曾国藩的有些著述评价甚低。如：在《湘绮楼日记》所载，光绪二年八月十九日，“晨起钞两页，《文公篇》毕”^⑪；光

^①（清）郭嵩焘. 郭嵩焘诗文集. 长沙: 岳麓书社, 1984, 181.

^②（清）王闿运著, 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 岳麓书社, 1997, 635.

^③（清）王闿运著, 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 岳麓书社, 1997, 636-637.

^④（清）王闿运著, 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 岳麓书社, 1997, 638.

^⑤（清）王闿运著, 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 岳麓书社, 1997, 638.

^⑥（清）王闿运著, 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 岳麓书社, 1997, 639.

^⑦（清）王闿运著, 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 岳麓书社, 1997, 557.

^⑧（清）王闿运著, 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 岳麓书社, 1997, 662.

^⑨（清）王闿运著, 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 岳麓书社, 1997, 590.

^⑩（清）王闿运著, 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 岳麓书社, 1997, 698.

^⑪（清）王闿运著, 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 岳麓书社, 1997, 510.

绪三年五月八日，“向樾岑借曾钞送熊师”^①；光绪四年二月十一日，“翻《曾滌丈文集》，见其少时汲汲皇皇，有侠动之志。因思诸葛孔明自比管、乐，殊非淡静者，而两人陈义皆以恬淡为宗，盖补其不足耶？然则余当以跌宕为志，不宜幽怨也”^②；二月十八日，“看《曾集》”^③；四月十五日，“画九江进军图，作《军志》。看曾《书疏》，未尝一日忘惧，似得朱儒之精矣，而成就不大，何也”^④；另外，他还参阅过《曾文正公年谱》，此书是由黎庶昌所编撰而成的。如：光绪二年闰五月二十九，“偕佐、笠步还，看《曾文正年谱》”^⑤；六月十九日，“阅《曾年谱》毕”^⑥。

王闳运还阅读了胡林翼的著作，主要有由幕僚汪士铎等人编辑郭嵩焘遗集而成的《胡文忠公遗集》。王闳运对胡林翼评价甚高，认为曾不及胡，并且为自己开始撰写军志时厚曾薄胡而内疚。如：《湘绮楼日记》所记载，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作《胡军篇》，看《咏芝奏牍》，精神殊胜滌公，有才如此，未竟其用，可叹也”^⑦；三月十六日，“看胡《奏稿》、《书札》及《方略》，见庚申年事，忽忽不乐。又看曾《奏稿》，殊失忠诚之道。曾不如胡明甚，而名重于胡者，其始起至诚且贤，其后不能掩之也。余初未合观两公集，每右曾而左胡，今乃知胡之不可及，惜交臂失此人也。乡非余厚曾薄胡彰著于天下，则今日之论，几何而不疑余之忌盛哉”^⑧。

对于当时所出现在大量私人有关湘军史事的著述，王闳运均作了专门的收集和采用工作，并且在采纳的过程中，还进行了严格的审订，予以评判。

3、注重采访和亲历所得

除了文书资料外，王闳运还曾通过采访知情人以广泛地收集有关湘军的资料。在《湘绮楼日记》中就有大量关于王闳运与时人谈论湘军史事的记录，如：光绪二年四月十一日，“至海馆樾、志己先在，香孙后至，谈左、郭之讎。左有幸灾乐祸之意，郭甚衔之。又言首府委员往讯办，因骂府县。余云必巡抚意也”^⑨；（朱克敬，字香孙，甘肃人，客居长沙，忧心国事，议论时政，被人目为“狂士”，一生喜交游，与湘军头面人物、幕僚、学术界名人交往甚密，尤其同郭嵩焘有30多年交情。彼此纵论时事，饮宴酬唱。）八月十七日，“暮，客去，欲稍休，闻玉泉山已集议作乱，亟往樾岑处，欲令会同府、县营兵严行禁止。至则邹叟在，力言必激变。事不干己，遂未尽言”^⑩；（裴荫森，字樾岑，阜宁洲门人，同治四年，

^①（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571.

^②（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635-636.

^③（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640.

^④（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653.

^⑤（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492.

^⑥（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496.

^⑦（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644.

^⑧（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648.

^⑨（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471.

^⑩（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509.

援例为道员，分省湖南，谒巡抚李翰章，督办团防总局。）光绪三年五月十八日，“午儿至松宅，赴介石招饮，陈臬、凌善、运仪同集。夜谈克安庆事，水陆各以为功，究不能明也”^①；（黄传义，字运仪，咸丰戊午科举人，江西候补知县）

从大量有关王闳运与当事人谈论湘军史事的事例中，可以发现王闳运非常重视这一搜集史料的方式。他企图通过征询知情人这种方式，以全面了解湘军史事，充分掌握编撰湘军史志的资料，而且在编撰《湘军志》中，也将通过查询来的资料予以充分地运用。如在论述湘军营制问题时，王闳运除了查阅有关文书资料外，还通过实地调查、巡访等方式，光绪六年六月十三日，“三曾来调试，旗生不到。吴棠未到任以前，达字八营援陕，分宝鸡、凤县、大安驿三处。果后十营援汉，果毅七营、达字五营援黔，又增五营，合以川军，共三十一营。周达武领八营攻越岑，共川军五营，又有防军二十一营，共百八营。同治三年冬，以湘果右军七营不力，裁撤，留二营，何胜必死，归胡中和节制。四年十二月田兴恕罢，周达武代之，仍留四川。湘果中军萧庆高平蓝逆于汉南，生擒曹灿章于周沟”^②。这是王闳运通过征询知情人，了解到的有关于湘军营制的史料，并将这些史料与官方的案卷中湘军营制史料进行对比，这样才得以在《湘军志》中将湘军营制叙述清晰。如：在《曾军篇》中写道，“是时，湘营制：营三百六十人。中营罗泽南将之，左营王珍将之，右营邹寿璋将之，塔其布将兵勇成二营，周凤山、储玖躬各将二营，曾国葆将一营。国藩仍欲充广至六千人，合忠源所将成一万为义师。”^③另外，王闳运为了进一步清楚记录湘军营制的变化，还特立了《营制篇》，篇中不仅记述了陆军营制，还叙写了水师、马队营制。

又如王闳运入川后，也正是依据知情人的叙述，对《湘军志》中有关湘军在蜀的战事做了很大的修改和补写，如：光绪七年八月八日，“校《军志》五篇”^④；八月九日，“自校《军志》毕”^⑤；八月二十七日，“又校《湘军志》”^⑥。当时他在尊经书院任教，对于蜀事也有较多的讨论。如：在《湘绮楼日记》中所载，光绪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鄂生来，久谈蜀中战事”^⑦；（唐炯，字鄂生，贵州遵义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咸丰间历四川南溪知县、署绵州事，同治初统安定营，于长宁败太平军石达开部。）八月二十八日，“将作《援蜀篇》，以采访未集而罢”^⑧；光绪七年七月三日，“翻《钞报》，作《援蜀篇》，请薛丹庭来，略问寇始末”^⑨；七月四日，“钱宝钎来，言四川土寇破一府十三县”^⑩。这些都成为王闳运校

^①（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573.

^②（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924.

^③（清）王闳运. 湘军志. 湘军史料四种. 长沙：岳麓书社，2008，23.

^④（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1041.

^⑤（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1041.

^⑥（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1044.

^⑦（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947-948.

^⑧（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948.

^⑨（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1029.

^⑩（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1029.

对《川陕篇》的重要史料。如关于“四川土寇破一府十三县”^①这一史事时，王闳运在《援川陕篇》中对于有所参考，“于时，崇厚代望颜，增募军至三万，游弁骄将坐食而行掠。寇所略围邛州、雅州、峨眉、潼川，所破青神、丹棱、名山、天全、荣经、洪雅、隆昌、荣昌、江油、长宁、兴文，一魁一部，分掠四出，各有所结，掳无虑百万。”^②

另外，在《湖北篇》中所揭露的李续宾排挤蒋益澧之事，“……及续宾代将，益澧屯鲁港，寇大攻之，请援中军，续宾报曰：‘力不能相救，守、走唯公意’。益澧大沮，即升瞭楼，撤其楼，唯置旗鼓，下令军中曰：‘贼势盛，我死此矣，诸军欲走者自去。’众惊愕相顾，凭垒死守。寇攻一日引去，益澧不待报而行”^③。这也是王闳运在四川通过采访湘军将士得到的史料，具体情况见《湘绮楼日记》所载：光绪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陈总兵来，言滌庵忌蒋香泉，陷之鲁港，为寇围，蒋登望楼吹角而寇退，遂告归。胡抚留之，蒋遂大骂，使留此人，无三河之败也。又言罗山分三道攻武昌，寇穴城出战，营几陷，罗故突战，被炮伤遂死。足补《军志》所未详也”^④。（李续宾，字滌庵，湖南湘乡人；蒋益澧，字香泉，同为湖南湘乡人，二人均为罗泽南部下，在军不相上下。）

更值得一提的是，王闳运在《湘军志》中的一些记述和议论，还有许多是根据他自身的见闻而来的。如《湖南防守篇》记载的咸丰二年太平军攻长沙的史事，其中形容清军将领惊慌失措的状况时，王闳运这样写道，“鲍起豹居城南楼，迎城隍神大像与对坐”^⑤。此事又见于《独行谣》自注：“寇攻南楼，提督鲍起豹迎善化城隍神大像与对坐，人呼为鲍斋公”^⑥。按中语：当时王闳运随城入。^⑦这是王闳运亲身所经历的事情，在官方公牍中是很难看到的。其后，王定安改订编纂《湘军记》中，也有“提督鲍起豹昇城隍大像置南城楼”^⑧这一节内容。虽然不能十分肯定就是参照王闳运的《湘军志》而来，但是毫无疑问会有一些联系。

通过亲身经历，以及采访、咨询当事人或知情者，无疑是搜集史料的一种有效方式。从这种途径得来的史料再与相关的文书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参照对比，可以尽可能地还原历史原貌。

三、蔚成一家之言的历史认识

利用搜集而来的史料，王闳运于光绪四年开始了《湘军志》的编撰工作。据《湘绮楼日渐》中所载：光绪四年二月八日，“撰《军志》一页”^⑨。此后，他几乎每日进行。最终，

^① (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1029.

^② (清)王闳运. 湘军志. 湘军史料四种. 长沙：岳麓书社，2008，140.

^③ (清)王闳运. 湘军志. 湘军史料四种. 长沙：岳麓书社，2008，35.

^④ (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767.

^⑤ (清)王闳运. 湘军志. 湘军史料四种. 长沙：岳麓书社. 2008. 5.

^⑥ (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诗文集. 长沙：岳麓书社，1996，1166.

^⑦ (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诗文集. 长沙：岳麓书社，1996，1166.

^⑧ (清)王定安. 湘军记. 湘军史料四种. 长沙：岳麓书社，2008，344.

^⑨ (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635.

在光绪七年完稿。光绪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湘军志》校讫”^①。其中经历了初创、改稿、补写等多重撰写，最后《湘军志》十六篇得以完成。

《湘军志》还体现出了王闳运独特的历史见解和认识，诚如徐一士所评论的那样。

“特闳运之独往独来，少所瞻顾，振笔直书，断制自如，蔚成一家之言，自非定安所逮，而文章之雅健雄奇，使读者感浓厚之兴味，留深刻之印象，恶之者亦叹美不遑，而忽嫉所以甚焉？”^②

这种独特的历史见解和认识，主要体现在王闳运对《湘军志》篇目安排及其对有关史实的一些思考和分析方面。

王闳运对篇目的安排是经过细致考量的。如：在《湘军志》中王闳运立《曾军篇》而不立《湖南篇》。为此，郭嵩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湘军志平议》中，郭嵩焘批注《曾军篇》篇名时说。

“以《湘军志》为名，自应以曾文正公创立湘军为主，不宜特立‘曾军’名目，以使有所专属。如江忠烈、王壮武、萧启江、李忠武及今曾威毅伯，皆别立一军为统帅，功绩又最伟，别为一篇可也。”^③

从这里可以知道，郭嵩焘认为以《曾军篇》命名是将曾国藩并列于其他将帅之中，抹煞了曾国藩在湘军中的领导地位。

其实，王闳运在撰述《湘军志》的初期是作了《湘军篇》的，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晨作《湘军篇》，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同坐一船”^④；二月二十七日，“作《湘军篇》，因看前所作者甚为得意，居然似史公矣。不自料能至此。亦未知有赏音否？”^⑤但为什么成书后只见《曾军篇》而不见《湘军篇》呢？而且，王闳运在撰写完《曾军篇》之后，还甚为得意，似乎对此非常满意，光绪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作《曾军篇》成，共十二页……甚为得意”^⑥。

探究《湘军志》中篇目的变化，可以从他在日记中可以找到一些根据。在日记中，王闳运开始撰写《湘军志》时对曾国藩是非常仰慕的，甚至梦到与“曾同坐一船”^⑦。可是到了后来，王闳运在日记中记载，“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济，且与渠亦无济，反有损”^⑧。这段叙述了曾国藩在江西时的情景，即湘军攻占武昌后，咸丰皇帝便令曾国藩率领水陆各军乘胜东下，进攻江西、安徽的太平军，使得曾国藩脱离后方，锐兵轻进。随着湖口、九江的战败，太平军在江西的军事形势发展到最高

^① (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1044.

^② 徐一士. 王闳运与《湘军志》. 逸径. 1936(16).

^③ (清)郭嵩焘. 湘军志平议. 湘军史料四种. 长沙：岳麓书社，2008，230.

^④ (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642.

^⑤ (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643.

^⑥ (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644.

^⑦ (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642.

^⑧ (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643.

峰，控制了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四州县，造成湘军数年在江西陷于进退维谷的困境，曾国藩困守在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文报不通，中断联系，坐困江西。王闳运对于曾国藩当时的“悲苦”^①是表示同情的，但又认为他的“悲苦”^②却是无济于“国事”^③，因为是王闳运认为既然已经造成了坐困江西的结局，那么只能想着如何破解困局，而不是一味地感慨“悲苦”^④的境况。之后王闳运将曾国藩与胡林翼两人进行了比较，觉得曾国藩甚至不如胡林翼。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作《胡军篇》，看咏芝《奏牍》，精神殊胜涤公，有才如此未竟其用，可叹也”^⑤。这种观点随着《湘军志》撰写的展开，更加明显。在后面，王闳运在日记又再次将曾、胡二人进行了对比，“看胡《奏稿》、《书札》及《方略》，见庚申事，忽忽不乐。又看曾《奏稿》，殊失忠诚之道。曾不如胡明甚，而名重于胡者，其始起至诚且贤，其后不能掩之也。余初未合观两公集，每右曾而左胡，今乃知胡之不可及，惜交臂失此人也！向非余厚曾薄胡彰著于天下，而今日之论，几何而不疑余之忌盛哉”^⑥。这些日记中的记载，足以说明王闳运篇目的变化是其对曾国藩与其他湘军人物比较出来的结果。因而，在军志中将《湘军篇》改为《曾军篇》，并将《胡军篇》改为《湖北篇》。

在史料搜集过程中，不断地予以调整，这显然是一种正确地处理史料和编撰史书的方式。或许王闳运这种对于文章的篇目安排，正如郭嵩焘所写的那样，有故意贬低曾国藩，抬高胡林翼的成分，但是并不是为了一味地抹杀曾国藩功绩而如此谋篇布局的，而是王闳运基于自己对历史的认识，而采取的与世人不同的立场。

王闳运对于相关史事的撰述也进行了思考与分析。如：关于《曾军后篇第五》中雨花台战役的描写。当时，曾国荃率兵在雨花台，和彭玉麟率领的水师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为此，李秀成集兵前来解南京之围。十月上旬，李秀成集齐了二十余万太平军由苏州西进，到达南京城外，将曾国荃的三万围城军包围起来。当时，李秀成的兵力远远大于曾国荃军，但是李秀成军从十月十三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发动进攻，共计进行四十六天。然而，却以失败告终。

这场战役中，曾国荃率领的三万兵力战胜了李秀成率领的二十余万太平军，这是一场足以让曾国荃引以自豪的战争。可是，这次战役在《湘军志》中的论述却大大出乎曾国荃的意料，“闰八月，苏、常寇来攻曾国荃军，多发西夷火器相烧击，复穴地袭屯垒，连十昼夜不休。九月，浙江寇复来助攻，国藩急征援兵，皆牵制不得赴。国荃以三万人居围中，城寇与援寇相环伺士卒伤亡死牢蔽，然罕搏战，率恃炮声随震骇。盖寇将骄佚，亦自重其死，又乌合大众，不知选将，比于初起时哀矣。十月，寇解去……”^⑦。王闳运在《湘军志》中用百余

^① (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643.

^② (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643.

^③ (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643.

^④ (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643.

^⑤ (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644.

^⑥ (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 湘绮楼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1997，648.

^⑦ (清)王闳运. 湘军志. 湘军史料四种. 长沙：岳麓书社，2008，67.

字就将这场战役叙述完毕。为此不只曾国荃看了感到愤恨，郭嵩焘看后也愤愤不平地写道：“李秀成以三十万众围曾军三万人，搏战四十余日，用火药轰其营垒，破其地道无数，极古今之恶战。壬秋一意淹没其劳，以数语淡淡的之，其使人气沮。”^①

作为与《湘军志》对比的《湘军记》，在文中则对雨花台战役大肆夸赞。文章首先从描数两军的兵力入手，称“伪忠王李秀成引兵三十万，自苏、常奔至，号六十万，东起方山，西迄板桥镇，连营数百”^②；与之相对的曾军“兵不满三万，贼围之数匝；彭玉麟、杨岳斌水师，皆阻隔不相闻”^③，再加之“金陵围师亦苦疾疫”^④，即病疫盛行，“死者山积”^⑤。随后又用大段的文字写到曾国荃慷慨誓师的情况，“贼以全力突围，是其故伎，向公、和公正以退而致挫。今若蹈其覆辙，贼且长驱西上，大局倾覆，何芜湖之能保？夫贼虽众，皆乌合无纪律，且久据吴会，习于骄佚，未尝经大挫。吾正苦其散漫难遍击，今致之来，聚而创之，必狂走，吾乃得专力捣其巢，破之必矣”^⑥。这里说曾国荃认为太平军虽然势众，但是是乌合之众，并且早就有与太平军主力决战之志愿，只苦无机会。接下来，王定安就用极其吹捧的文字，描述了曾国荃在外援不济，孤军受围的情况下，率湘军与太平军苦斗的情景。说，“乙亥，乃分围师为三，以其二防城贼侵袭，国荃自将其一当援寇”^⑦，即使“左颊受抢伤，血渍重襟，犹裹创巡营”^⑧。最后说：“国荃孤军居围中，战守四十六日，杀贼五万，我军亦伤亡五千，将士皮肉几尽，军兴未有此苦战也。”^⑨

对这次战役，在当时曾国荃权势日盛、众人都对雨花台战役赞叹有加的情况下，一般论者都是归于曾国荃的苦战坚持。而王闳运不同一般的写法，用“然罕搏战”^⑩这四个字概括了曾国荃军的苦战经过，显然他是有自己的见地。这种见地表现在王闳运不只是为了记录战争而记录，而是思考了战争背后所引发的思考，这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为什么六十多万太平军猛烈攻击区区三万重重被围的湘军却久久没有攻下？然而，事实上就是没有攻下。但其中的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除了王定安极力渲染的湘军苦战之外，王闳运不苟众论，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思考。王闳运透过这次战役激烈的表层，发现了太平军虽然“恃炮声相震慑”^⑪，但是很少近身搏战的史实，即太平军仅仅以火器向曾军得营地进行轰击。所以，即使李秀成军有西方先进的枪炮武器，却很难打败拥有

^① (清)郭振墉.湘军志平议.湘军史料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8,244-245.

^② (清)王定安.湘军记.湘军史料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8,459-460.

^③ (清)王定安.湘军记.湘军史料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8,460.

^④ (清)王定安.湘军记.湘军史料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8,460.

^⑤ (清)王定安.湘军记.湘军史料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8,460.

^⑥ (清)王定安.湘军记.湘军史料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8,460.

^⑦ (清)王定安.湘军记.湘军史料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8,460.

^⑧ (清)王定安.湘军记.湘军史料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8,461.

^⑨ (清)王定安.湘军记.湘军史料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8,461.

^⑩ (清)王闳运.湘军志.湘军史料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8,67.

^⑪ (清)王闳运.湘军志.湘军史料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8,67.

层层工事壁垒的曾国荃军。

第二，为何太平军围攻湘军四十六日竟然“罕搏战”^①？王闳运在《湘军志》中分析了其中原因，即太平军“将骄佚，亦自重其死，又乌合大众，不知选将，比于初起时衰矣”^②。纵观此时的太平军，可知王闳运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太平天国在天京事变之后，起义初期的太平将帅基本不复存在，兵力也大为削弱，再加之当时以洪秀全为领导的太平军将领，大多已经染上好货财、耽淫乐、奢华苟安、争权夺利等恶习，失去起义初期时的作风。在战场上，大部分将帅贪生怕死，不肯勇战，比初期衰败了很多。

王闳运在赞扬湘军雨花台取得胜利之时，也客观地将战争双方的情况纳入战争过程中，深入分析战争胜败的原因，不只盲目的夸大某一方的战功，对于史事的记录有着自己的独特看法和认识。

参考文献

- [1] (清)王闳运,郭振墉,朱德裳,王定安.湘军史料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8
- [2] (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湘绮楼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6
- [3] (清)王闳运著,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97
- [4] (清)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84
- [5] 朱东安.曾国藩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 [6] 王继平.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7] 徐一士.王闳运与湘军志.逸致,1936(16)

Xiangjun Zhi's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Hu SuZhen

(Hunan University Yuelu Academy, Changsha Hunan, 410000)

Abstract: Since Wang Kaiyun's Xiangjun Zhi inception, it faced the strongly criticism of some high-ranking military officers in the Xiang's Amry such as Zeng Guoquan and Guo Songtao. Later scholars also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evalution of Xiangjun Zhi. Some people think it is a good history, others think it is a slander history. The article analyzed Wang Xiangjun Zhi through the attitude towards history, drawing ideas and understanding history of Wang Kaiyun, in order to objectively and impartially reveal Xiangjun Zhi's historical achievement.

Keywords: Wang Kaiyun Xiang's Amry Xiangjun Zhi

^① (清)王闳运.湘军志.湘军史料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8,67.

^② (清)王闳运.湘军志.湘军史料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8,67.

